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编

# 梁山泊

《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

〔日〕佐竹靖彦◎著

韩玉萍◎译 王铿◎审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編

# 梁山泊

《水滸傳》一〇八名豪杰

〔日〕佐竹靖彦◎著

韩玉萍◎译 王鏗◎审译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日)佐竹靖彦著;  
韩玉萍译;王铿审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638-X

I. 梁… II. ①佐…②韩… III. 《水浒》研究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463 号

- 
- 书 名 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著 者 (日)佐竹靖彦  
译 者 韩玉萍  
审 译 王 铿  
责任编辑 齐浣心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99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38-X/K·2001  
定 价 12.00 元
-

# 总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



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



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珍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闻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 序 言

辛德勇

几年前,当我刚刚读到《梁山泊》一书时,颇有些意外。本书作者佐竹靖彦先生,是国际上声名卓著的中国史研究权威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论述明代通俗小说《水浒传》的书来?不过,惊奇过后,稍一思索,又觉得这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初古代通俗小说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在中国开其风气的胡适诸人,不正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从事文学研究吗?佐竹靖彦先生能够在治史之余,撰著此书,其实正是沿承着这样一种学术传统。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近代以来研治中国古代史富有造诣的学术前辈,大多都能够博及上下,融通文史。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欧美学者难以做到,就连日本和中国,学者所为,大多也只是狭而又狭的专门之学,很少有人能够兼通几个不同的朝代,或是不同的分支领域;若再进而求其出史入文之人,也就更为难得一见了。不过,佐竹靖彦先生却正是这样一位时下已相当少见的博雅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史两方面都具有广博的基础和深邃的造诣。

佐竹靖彦先生是我熟知的前辈学者,现年66岁,文学博士,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从19岁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读书时起,佐



竹先生即开始学习汉语，两年后专门攻读东洋史，接着又在京都大学研读东洋史硕士和博士课程，先后师承于小川环树、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等著名学者。学位课程结业后，起初任教于冈山大学，自1977年起，长期执教于东京都立大学，直至近年退休。

在史学方面，佐竹靖彦先生的研究，涉及到中国史的诸多时期和领域，从先秦到宋元，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化观念、典籍校勘，都撰有大量著述，特别是对于唐宋经济制度的研究，成就尤为卓著，除了诸多学术论文之外，还著有《唐宋变革之地域研究》一书，在1990年由同朋舍出版；在中国古代典籍研究方面，则整理出版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等。在个人的学术研究以外，佐竹靖彦先生还在日本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并于1991年创办国际史学刊物《中国史学》，担任主编，同时并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刊发文章，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增进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佐竹靖彦先生另与其他学者合作，召集日本学者编著出版《中国史学之基本问题》系列丛书，分为殷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系统论述了有关中国史研究的重大基本问题。

在已经刊布的著述当中，并没有见到多少佐竹先生研究明清史的成果。不过，佐竹靖彦先生的研究，却始终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出发，来认识具体问题。即以其耗费大量精力所从事的唐宋变革研究而论，佐竹先生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即是剖析日本学者所云“近世”亦即宋代以来迄止清朝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发展历程。所以，佐竹先生不仅一直高度关注明清史的研究，甚至还十分注意现代中国的社会态势。佐竹靖彦先生十分注意由中国现实社会而向上溯求古代的历史问题，明清史自然成为其间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环。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眼光和背景，佐竹靖彦先生在研究《水浒传》并撰写《梁山泊》一书时，并没有像很多中国历史学者那样，过分集中于挖掘梁山好汉故事产生的背景时代亦即宋代的历史分析，而是将其放在从唐末直到明代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段上加以考察，将其视作反映唐末至明代中国历史状况之民间传说和民间文艺的集大成作品。

以唐末至明代的社会状况为背景，佐竹靖彦先生分析指出，唐代末年以来的社会变动和辽、金、元诸北方民族政权对汉族的压迫，是贯穿于《水浒传》中的两条基本历史脉络。佐竹先生以明容与堂刊百回本《水浒传》为体现作者本义的原本，分析指出，其前四十回，可以视作《水浒传》的第一部分内容。在这一部分，一方面，集中描绘出唐末以来出现的庶民社会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一社会行为方式，而这一社会变动更具体的体现，则是本来施之于罪犯身上用作囚徒认证标识的刺青纹身符号，这时已被改用为英雄好汉的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水浒传》中所描述的杨志、张顺等人的行为，与杨家将故事具有直接关联，是汉族人士反抗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压迫的意识和行为，在《水浒传》中的反映。作为一位富有造诣的历史学家，佐竹先生为论证唐末以来社会变动在《水浒传》中的反映问题，在书中着力考述了“一丈青”这一绰号的语义及其来源，不管是考述的深度，还是着眼点的广阔，都超越了以往学者的研究，体现出精到的学术见识。

梁山泊是将一个个行侠者和反抗者结合起来的英雄天地，宋江对朝廷的忠义和李逵对朋友的忠义，则是这些英雄好汉得以结合成为一个集团的最高价值理念。从第四十一回到第八十二回，



可以视作《水浒传》的第二部分内容。梁山英雄聚义的过程和理念，都投射着明初汉族政权复兴历程的映像。接下来从第八十三回到第九十回的征辽和九十回以后的征方腊，有更多的虚构成分，这两部分内容，在历史背景上，与朱元璋的起家经历、明初汉族民族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同《西游记》的产生一样，与明代社会上盛行充满道教色彩的艺术幻想相关联；而明代王府盛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活动，则为加入这更多的虚构成分而使得《水浒传》一书最终能够产生，提供了文艺基础。

佐竹靖彦先生在后记中称自己的新见为“假说”，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不过，在《水浒传》这样的名著研究中，提出诸多全新的见解，并不容易一下子全部被人接受。譬如，佐竹先生提出，较早讲述梁山英雄故事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其成书时间，要晚至明代初期，而在中国学者看来，此书出自元代，应当没有什么问题，今存台北的黄丕烈旧藏本，虽说题作“宋末建刊本”并不可信，但到底有没有晚到明初的可能，似乎还可以再加斟酌。

学术需要在交流中向前行进。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难免会有不同看法，但读者都会看到，《梁山泊》既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学研究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佐竹靖彦先生的《水浒传》研究，其研究视角上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更重于具体的看法。在中国翻译出版这部著作，一定会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特别是贯通文、史研究两大界域，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梁山泊》一书是以历史学的眼光研究古典文学名著，佐竹先生近日刚刚又出版了一部《刘邦》，是以文学的笔法写历史人物传记，文笔生动而新见迭出，在贯通文史这一点上，二者可谓异曲同工，共臻其妙。希望很快也能够有汉译本出版。

# 目 录

序 言	辛德勇
前 言	1
第一章 《水浒传》的舞台	5
梁山泊——黄河造就的水洼	5
太行山曾有松林	8
《水浒传》的四个舞台	9
第二章 《水浒传》的构成	13
天罡星三十六人和地煞星七十二人	13
《水浒传》标准本一百回本	14
《水浒传》第一部分为义士列传	16
宋江主导地位的确立	17
远征辽国	24
《水浒传》结尾为讨方腊	25
第三章 《水浒传》座次及其变化	29



天罡星三十六英雄 .....	29
《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杨志、林冲、公孙胜 .....	31
《大宋宣和遗事》产生于明初 .....	34
军官团伙最早的根据地太行山 .....	37
刺青团伙的根据地梁山泊太行山 .....	41
胥吏一衙役团伙的根据地梁山泊 .....	43
编外的大人物 .....	48
<b>第四章 水游戏和两个罗贯中</b> .....	<b>51</b>
元初的水游戏 .....	51
元末明初的水游戏 .....	53
原本的水游戏没有讨辽故事 .....	55
第一代罗贯中和第二代罗贯中 .....	57
<b>第五章 由小官吏走向大英雄的宋江</b> .....	<b>61</b>
宋江——莫名其妙的人 .....	61
喜剧性悲剧的主人公黑三郎宋江 .....	63
宋江的绰号“呼保义”的含义 .....	66
宋江之弟铁扇子宋清 .....	68
通向大英雄之路 .....	72
<b>第六章 鲁智深和李逵</b> .....	<b>75</b>
义士列传中的英雄皆为独行侠 .....	75



舞台的主角黑旋风李逵 .....	75
说书中的大英雄鲁智深 .....	83
杀人及其场景 .....	87
李逵行动小组的成立 .....	88
李逵行动小组的三个形式 .....	91
讨方腊之说和李逵行动小组的 构想——加上说 .....	93
<b>第七章 公孙胜和讨伐辽国 .....</b>	<b>99</b>
受伤的汉民族自尊心 .....	99
抵抗契丹的英雄杨业及杨家将故事 .....	100
种家将的故事 .....	104
善使魔法的公孙胜原是讨方腊的主角 .....	105
讨方腊故事和明代书会 .....	107
<b>第八章 美女与刺青</b>	
——一丈青扈三娘 .....	109
绰号的重要性 .....	109
一丈青指细长之物 .....	110
青龙一丈青 .....	112
不安分的无赖之心 .....	114
高雅的《水浒传》之一丈青 .....	118
英雄一丈青 .....	119





女无赖一丈青 .....	122
第九章 九天玄女和宿元景 .....	127
梁山泊守护神由晁盖变为九天玄女 .....	127
宿元景乃星宿化身 .....	129
道教式幻想和《水浒传》 .....	133
《水浒传》地理知识的蓝本为《元史》 .....	135
后 记 .....	139